

目 录

缅怀刘志超司令员.....	柴泽民 (1)
怀念民族英雄康俊仁同志.....	席荆山 (4)
清气留青史 精神永不泯	
——忆哥哥丁行.....	丁建之 (9)
梦.....	臧克家 (20)
李子和烈士生平传略.....	李 辉 张满亮 (22)
硬骨头共产党员卢钊斌.....	卢海清 (29)
忆康清合烈士.....	康振苏 (32)
革命烈士任克温.....	任史忆 (36)
宁死不屈的周玉生烈士.....	张英民 (40)
忆司马村“三九三”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们.....	卢海清 (43)
回忆烈士胡成玉.....	胡宝玉 (46)
忆战友李江水、薛忠民、周效文三烈士.....	丁建之 (48)
夏县革命烈士名录	
夏县革命烈士概况一览表.....	(53)
城关镇.....	(55)
尉郭乡.....	(66)
裴介镇.....	(78)
庙前镇.....	(88)
水头镇.....	(103)
禹王乡.....	(120)

胡张乡.....	(137)
捻掌镇.....	(155)
大庙乡.....	(168)
郭道乡.....	(172)
泗交镇.....	(184)
曹家庄乡.....	(192)
祁家河乡.....	(197)
不明乡籍.....	(206)

缅怀刘志超司令员

柴泽民

抗日战争时期，晋南地区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我担任太岳五分区（抗战胜利后调整为三分区）政委时，就有三位分区司令员，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了。首任司令员兼康支队支队长的康俊仁和第四任司令员王庸的牺牲在地方史料中，已有记载，在人民群众中有许多动人的传说，而第二任司令员刘志超却几乎无人知晓，（第三任司令员孙定国在抗战胜利后调太岳军区任副司令员）是一位有姓名的无名英雄。这是因为他到分区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在与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一九四三年，在党中央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战区”的伟大号召下，条西地区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蓬勃发展，坚持在山区和平原地带战斗的康支队、五支队、九支队、十支队、县支队及各县区大小抗日游击队，都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猛烈地进攻。敌人疯狂报复、拼命抵抗，战斗异常地频繁、紧张和酷烈。当时四分区和三分区之间——闻喜县和垣曲县部分地区，还有一股国民党特务武装，号称“晋南野战军”，群众叫他贾部，因该部匪首名叫贾真一。他们与敌人勾结，专肆破坏和袭击我抗日武装，军区给五分区派来的干部，通过该部地区被抓住后即行残酷屠杀，一次军区派来刚从抗大毕业的八名军队干部，在穿过绛垣公路日

寇的封锁线，到达垣南的朱家庄，就被贾匪抓去，全部活埋在闻喜的横榆村。我们与贾匪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

一九四三年八月初，在扩大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分区司令员康俊仁同志，英勇牺牲了。几个月后，太岳军区委派刘志超同志来担任司令员。他和四分区参谋长冯靖华率领十七团和七七二团，打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堵截，挺进到五分区，他们一到，就协同分区部队，一举歼灭了贾真一的主力部队，旗开得胜。使太岳第四军分区和第五军分区两块抗日根据地联结了起来。尽管中间还有绛垣公路日寇的封锁线，但单纯地对付日寇总是容易些。

中条山抗日武装力量的加强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更加引起了日寇的报复和进攻。八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打完消灭贾真一的战斗，部队刚驻到闻喜县南的翅儿山两翼，当晚接到情报，说贾匪勾结日寇要上山扫荡。我们立即作了反扫荡的准备。次日天刚明，即发现山下有众多的日寇，在山沟里隐蔽不动。我与志超同志判断，山下埋伏隐蔽的敌人，可能是等待另一股日军，从山左面迂回到山顶，然后上下夹击消灭我军。情况万分紧急，部队只有向右翼的汤王山方向突围。但是，十七团驻在另外一个山村，需要把敌情和我们的战斗部署告诉他们，因他们初次来到五分区，地形、情况都不熟悉，尤其处在贾匪地区，形势对我不利。于是我们派了三次通讯员，去向十七团送信联络，都不见回报。事不宜迟，刘志超司令员留在司令部指挥部队迎击敌人的进攻。我带一个警卫员亲自赶到十七团的驻地，带领他们进行突围的战斗。趁着拂晓前的黑暗，部队穿过一条沟，刚上到汤王山半山腰，山下的敌人就从山沟中冲了上来，截断了翅儿山部队

撤向汤王山的道路。山顶上的敌人，也凶猛地压了下来，敌情十分紧迫。担任掩护任务的十七团的一个营和分区司令部处境十分危机。有的阵地，在敌人的夹击下，退了下来，分区机关面临着敌人的冲击。在这千钧一发的险恶时刻，刘志超司令员身先士卒，带着部队冲了上去，打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掩护了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刘志超同志在这次同敌人反复地拼搏中，把他的鲜血洒在闻喜翅儿山上。

志超同志牺牲时约三十多岁，他年轻、精干、细高个儿，说话风趣、英勇善战。但他一到分区，不是行军，就是战斗，我连分区的全面情况，都来不及向他详细地介绍，更不用说别的了。所以，志超同志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甚至连是哪里人，都没有来得及交谈。听他的口音，象南方人，但也有河南味儿。有个战士说：“司令员，你说话象江西老表！”他说：“你说老表就老表吧！”战士们要他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他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那顾得讲，往后咱们一起共同谱写新的故事吧。”就这样，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创作了一曲壮烈的战歌。他死后，无墓、无碑（因为敌人的反复扫荡，十七团和七七二团已撤回四分区去了，贾匪残部又回到他们活动的地区了，志超司令员的尸体同牺牲的战士们被当地群众掩埋在一起）无史料记载，无更多的人知晓，只有一座巍峨的翅儿山，立在中条山的万花丛中，陪伴着他的英魂。

烈士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每当思之，感触万端。追溯一点记忆，作为历史的补白，也是我对战友刘志超司令员的怀念。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二稿于北京

怀念民族英雄康俊仁同志

席荆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为了进一步投降日寇，扫清“绊脚石”，便发动了“十二月政变”疯狂地向决死队、八路军进攻。在中条山一带，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便于一九四〇年春，全部撤至太岳区根据地。中条地委，各县县委亦转入“地下”坚持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向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这时，驻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不下十万人，但敌人进攻时，竟不战而溃，使群众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日夜盼望八路军重来，消灭日伪军，保卫家乡。中条山地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要求，决定重新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那么没有军事干部怎么办，没有武器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没有军事干部只好在战争中培养，没有武器只好向敌人要，白手起家。这是我党建党以来的传统。留在当地坚持工作的同志都有信心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久，在战争的烽火中培养出许多土生土长的优秀的军事干部，康俊仁同志就是集中最为突出的一员。

俊仁同志，夏县周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一面务农，一面卖青菜维持生活。一九三五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二月政变后，他留在家乡做支部工作，当他听到党计

划重新组织武装时，便自动地向党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我党考虑到周村位于中条山脚下，党的工作基础好，俊仁同志在群众中又有威信，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有许多好处，于是批准了他的要求。周村附近的群众，听说他们平素所敬爱的康大个儿（俊仁同志身材魁梧，这是群众对他的亲切的称呼）要成立队伍打日本鬼子，便纷纷报名参加，有的还把暗里保存下来的枪支弹药送给部队，这支武装，就这样很快组织起来了，并由康俊仁同志任支队长。这便是后来威震中条山的康支队。

起初，日寇是根本看不起康支队的。说什么“土八路，小小的有，皇军来个他们大大地普鲁普鲁的有！”可是，这支游击队却给予日寇接二连三的致命的打击。袭击尉郭镇炮楼时，三个鬼子五个伪军全部被消灭。该支队五大队十几个队员化装成商人和卖柴的打进捻掌镇日寇据点，活捉了两名日寇，打死打伤十几名日伪军。打进唐回据点，生俘大汉奸李殿臣，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三大队打进泗交据点，打死打伤日伪军十余名。张家后的伏击战，打死日寇十五名，俘虏伪军二十余名。特别是抢粮的日伪军接二连三的遭到了康支队歼灭性的打击。敌人受到康支队的沉重打击后，才惊呼：“大太君康俊仁，他的八路游击队勇敢的有，我们多少弟兄死了死了的有！”康支队不仅日日夜夜同凶恶的日寇进行搏斗，而且还得对付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正规军溃败后，特务贾真一重新组织起来一股武装土匪，加上阎锡山的正规军和地方特务武装，就是两个死对头。因此，战斗一天天频繁起来，几乎每天都有大小不同的战斗。更可恨的是有时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公开的配合起来，联合进攻我们。

那时，康支队的活动地区完全是游击区，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太岳根据地晋豫区党委的领导完全隔绝开来。中条山区的根据地是重新建立起来的，而且自从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条山事变”后，群众大部分逃离山区。山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再加上不到二十里就有敌人一个钉子（即据点），斗争残酷，且很频繁，根据地并不甚巩固，无论是生活方面或对敌斗争方面，都是相当艰苦的。但就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拥护，加上康俊仁同志善于指挥战斗，我们的势力不是缩小了，而是日益壮大了。除康支队之外，五支队、十支队、各县大队、区干队，都纷纷建立起来了。太岳三分区也于一九四四年冬正式成立。康俊仁同志担任分区司令员（刘子超同志任副司令员，柴泽民同志任分区政治委员）。逃出山区的居民，陆续返回家乡。经过减租减息，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民兵也组织起来了。这时，在闻喜，垣曲山上的贾真一匪邦完全被赶出山区，贾真一被击毙于皋洛镇。山区的日寇据点，在我们的围困打击下，一个个地撤除了。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只剩下洒交、唐回两个据点。

当然，日寇和匪特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越到垂死关头，越显得疯狂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寇抽调了三万多日伪军，配合贾真一匪邦残部，分四部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军民积极配合，以反“扫荡”扑灭了敌人的第一次“扫荡”凶焰。中间仅仅隔了十天，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扫荡”。敌人的两次“扫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康俊仁同志勇敢机智的指挥下，都被击溃了。经过这两次极其残酷的反“扫荡”战斗，证明我们三分区的军民是得

起考验的。敌人是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了，我们的司令员康俊仁同志在群众中，威信也更加提高了。

当第二次反“扫荡”结束后，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为了给在反“扫荡”中牺牲的副司令员刘子超同志和其它死难烈士报仇，三分区准备组织新的打击日寇的战斗。为此，康俊仁同志亲自下山侦察敌情。当俊仁同志返回李家坪司令部时，由于他的卫士班都是穿的缴获的日寇的黄呢子大衣，戴的钢盔，致使司令部的一个哨兵发生误会而鸣枪。不幸，康俊仁同志被误伤而毙命。这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俊仁同志是一位黑面大汉，外表粗犷，内心机灵，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机枪射手，而且还会修理机枪。三分区小型兵工厂的学徒大半是他培养起来的。各支队的枪支坏了，他往往亲自帮助修理。他虽然是个文盲，但由于努力学习，后来已经能看懂普通文件和书籍。他虽然没当过兵，没住过军事学校，但在战斗烈火中很快地锻炼成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几次较大的战斗，都由他亲自指挥。在有名的磨子穴战斗中，敌人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阵地猛扑，俊仁同志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和他弟弟康俊义同志各操一把机枪，英勇而机智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敌人死伤很重。最后，敌人集中力量在炮火掩护下又冲上来，并大叫“活捉八路大太君康俊仁！”这时，俊仁同志沉着勇敢，重新组织了力量，再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达到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俊仁同志从容地率部队转移阵地。俊仁同志的弟弟——康俊义，就在执行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中光荣牺牲了。

俊仁同志任队长时，不仅关心他的支队，而且对兄弟支

队的成长壮大也十分关怀。上级从康支队抽调人员武器，补充各兄弟支队，他从来是慷慨的。在配合兄弟支队对敌作战时，他总是要求党分配给康支队最艰巨的任务。他对兄弟支队，从来不骄傲，总是虚心地征求各支队长对于他们的意见。因此，俊仁同志，不仅在康支队威信很高，而且在兄弟支队中的威信也相当高。

俊仁同志的生活作风是艰苦朴素的。他身上时常穿着破旧的布衣布鞋，手里拿着旱烟袋，见了群众总是笑哈哈地问寒问暖，平易近人。不了解他的人，绝看不出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康俊仁。因此，群众愿意接近这位杀敌英雄，有什么心思都愿意向他谈。这样，俊仁同志就能随时随地了解民情、敌情，争取主动解决群众困难和打击敌人。

俊仁同志，对于党的领导很尊重，只要是组织上的决定和指示，他从来是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例如，分区建立基干团，上级决定首先改编康支队，俊仁同志积极地拥护党的决议，帮助党胜利地完成了整编任务。俊仁同志能够虚心地检查自己，改正缺点和错误。一次他没有和地委研究（分区成立前，部队直接归地委领导）就带了几个战士，化装成商人，混进墟掌敌人据点，把一个女汉奸抓出来处死了。当地委知道后，对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并做了深刻的检查。

我们这位纯朴的农民出身的民族英雄，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这里介绍的，仅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

浩气留青史 精神永不泯

——忆哥哥丁行

丁建之

哥哥丁行（1908——1948），字行之，另名可仕，中共党员。学生时期，就多次参加我县的历次革命运动。因此，为反动政府所不容，被迫逃亡陕西，加入国民党西北军，一干就是二十年。由士兵升到将军，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虽然在西北军中，却一直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给党给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南京。一九四八年九月被蒋介石杀害。全国解放后，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行之被蒋介石杀害，已四十余年。但他那清秀白晰的面庞，亲切和蔼的态度，刻苦学习的精神，却在我的脑海里时时出现，永远难以忘却。

（一）

我幼年时极为调皮，但他从不叱责，反而很是爱护。在学习之暇，常常领着我，拿上他心爱的口琴，到我家后门外城墙上去顽耍。每当奏完一首歌曲，就微笑着问我：“好听

吗？”“好，好听极啦”我拍着手回答。

他除有事外，从来不上大街蹓跹。一贯不和其他孩子打闹。邻舍都夸奖说：“这孩子就是好。”

母亲对我俩的评语是：“一个淘气鬼，一个书呆子。”

过新年是我最欢乐、最高兴的日子。吃好的，穿好的，尤其是放爆竹，太好玩啦！但他还和平时一样在专心学习，好象不知道今天是新年。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听到鸡叫，我就很快从床上爬了起来。任凭我喊叫多少次，他就是不声不吭。我嘟囔着嘴说：

“书呆子！”便离开了他的窗前。自个儿去燃放我的爆竹，刚才的不愉快，霎时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天明开了大门，土地、门神放在门墩石上。母亲面有愠色，但大年初一不好责备。他却微笑着说：“土地、门神的责任是看门守户，怎好坐在家里呢？”母亲说：“不祭也就算了，何必糟踏神呢？”自此众位神灵在我家里，就集体退位了。因此我送了他一个雅号——“姜太公”。

(二)

行之七岁随父亲（前清贡生，终身任教）读书。他除读五经四史外，更喜欢读新书。十一岁考入夏县第一高小。全县学生数次会考，均名列榜首，一时豪门、富户多来提亲，父亲都一一婉言谢绝。毕业后考入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这所学校是我县革命先烈嘉康杰创办的，其教育方针含有浓厚的革命思想，是一所进步学校。因此遭到豪绅恶吏的反对，并上报阎锡山，严令取缔。虽经几度交涉，多次斗争，结果无效，被迫停办。行之只好转入夏县一年制师范讲习所。他

本有较好的国学基础，在这期间又侧重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但读进步书籍在该校是不允许的，否则就有被戴上红帽子的危险！但他在平民中学，受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熏陶，立志要做一个马列主义战士，大胆地大读进步书刊。并毅然参加了“反抗房捐”，“反抗平民负担富户捐”，轰赶贪官县长张柳星和打击一些作恶多端的劣绅土豪等革命活动。

行之在师范讲习所修业期满，仍以第一名毕业，时年十七岁。毕业后被派往下留村小学任教，并在全县会考中获第二名。

一九二七年八月，经孙雨亭介绍，行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世益领导下，“中共夏县委员会”在下留村小学校成立了。以后“晋南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这两次重要会议行之都参加了。当时我在该校读书。这两次会议孙雨亭老师命我放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党的领导下，两次发动农民进城围攻国民党夏县县党部。行之是组织者之一，因遭反动政府残酷镇压，运动失败。一些同志被捕，一些同志被下令通缉。行之被迫逃亡陕西加入西北军。

(三)

行之在西北军池峰城部一直干了十多年。池十分赏识他的为入和才干。开始池任团长，他任中尉书记，后来池任旅长，他任上尉书记，池任师长，他任少校军法主任，最后，池任军长，他升任上校秘书处处长。

池峰城行伍出身，作战勇敢，没有文化。行之常常给他讲书、说文、谈论国际国内形势，提治军建议，并拟定改造部队计划。因此该部以军纪严明，勇敢善战而闻名。所以池峰城便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得以连连高升。然而行之的最终目的是引导池的思想进步，待机将部队拉出反革命阵营，走上革命大道。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平津相继失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全军辖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个师）奉命开拔前方，在河北省滹沱河一线佈防与日寇有过数次接触。后奉命坚守娘子关，阻击日寇期间将敌七十七联队全部歼灭，联队长鲤登行一起被击毙。尽管取得如此战绩，但战区内其他国民党部队，尤其是阎锡山部队，遇敌即退。致使二十六路军，孤军作战，牺牲惨重，只得且战且退。正当这时，贺龙将军却率领着八路军一二〇师，雄赳赳地挺进敌后。此景此情令二十六路军的池峰城三十一师全体官兵惭愧不已！后又看见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赴难，高歌抗战，鼓舞士气。池对此十分感慨，下决心向八路军学习。行之借机鼓动道：“咱们也搞一个服务团吧！”池表示同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行之奉池峰城命令赴西安收罗人员，组建“战地服务团”。

在西安“平津流亡同学会”拜见了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张之强（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两人寒暄后，行之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张听罢一愣，问道：“西安这么多团体，你却为何单找我们？”行之笑了笑没有回答，却说：“这事就拜托了！”张之强心想，看来这位国民党军官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便是倾向共产党的。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

人选很快决定，共男女二十余人，青一色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位留日学生。他们一行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于十二月下旬终于到达山西霍县三十一师驻地。不久“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池师长兼团长，副团长由行之兼任，征得池师长同意，行之和之强带着全体团员，到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进行了参观学习。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三十一师接到紧急命令，集结徐州。行之知道要和日寇打一场殊死的要战，考虑到团员的安全，不想让“服务团”上前线。但团员们抗战意识极强，一致请求“要上战场”，“要直接参战”，最后决定“服务团”的任务是：“战前鼓动”，“组织支前”和“采访报道”。就这样“服务团”随军助威上了前线，参加了名闻中外的台儿庄大鏖战。

在台儿庄血战中，“服务团”的同志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向部队高呼着行之亲拟的战斗口号：“三十一师誓与台儿庄共存亡！”并大唱《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激发了全师官兵同仇敌忾的战斗情绪，此一战全师官兵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大劈大砍。杀声四起，如山崩地裂，直杀得鬼子尸堆如山，血流成河。致使日寇的精锐矶谷师团全部复没，永无东归之日。

作为池峰城精神支柱和智囊的行之，打起仗来不离其左右。除协助指挥战斗外，每当夜晚乘敌人暂停进攻的空隙，还要指派团员到前线指挥所和池师长谈心。坚守一隅，一发千钧，作为主将无疑是心力交瘁。如有片刻松施，就是莫大的享受。血战七天七夜，池师长很少合眼，只有“服务团”团员到来，才使他暂时忘掉战事。这一安排，足以说明行之

在激战中的沉着、冷静、周密、细致和用心之良苦，战后池峰城被誉为“铁血将军”、“抗日名将”，这与行之对池的长期影响和协助是分不开的。

当台儿庄战争打响后，全国各党派的大报社记者，立时云集徐州，展开了一场“新闻战”。行之试探地问：“咱们先请谁？”“《新华日报》！”之强回答。行之微笑点头，立刻请来了《新华日报》的陆贻，《大公报》的范长江，还有诗人臧克家。并亲自带着他们进行战地采访。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战，压制革命力量，下令撤销“战地服务团”，行之为了保存党在池部的革命力量，征得池的同意，以子弟学校需要教师为由，暗将共产党员蒋牧良等四位同志留下，并举荐牧良为他的讲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池对行之是多么的信赖啊！

张之强和其余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池部。

(四)

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当时抗战形势需要，又派张之强同志回池部。这时部队驻防河南舞阳。池峰城已升任三十军军长，行之任军部秘书处上校处长。二人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庆幸今后又能在一起工作了！

九月的一天，之强忽然对行之说：“朱、彭司令为了和池团结合作，共同抗战，派代表与其秘密谈判，要你尽力促成。”行之思索片刻说：“这可是件大事啊，要担极大的风险。”“那就算了吧！”“不！我试探试探，如果事情不成，你就要赶快离开这里。”第二天行之对之强说：“池军长果然担忧他的身家性命。但他又说，世人都称我‘抗日名